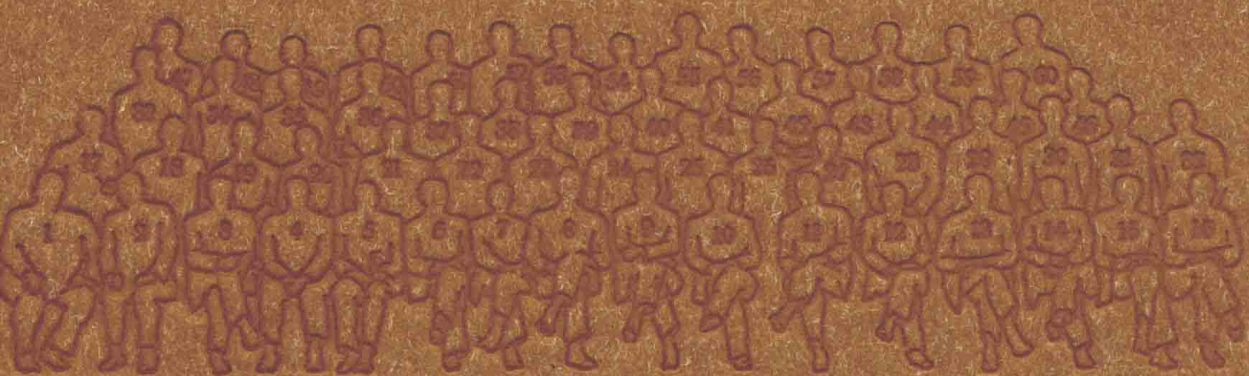




# 北美中國學

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主 编：张海惠  
副主编：薛昭慧 蔣树勇

# 北美中国学

## ——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 Research and Resources

张海惠 主编  
薛昭慧 蒋树勇 副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张海惠主编. - 北京:中华书局,2010.11

ISBN 978 - 7 - 101 - 07542 - 7

I. 北… II. 张… III. 汉学 - 研究 - 北美洲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665 号

---

书 名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主 编 张海惠

副 主 编 薛昭慧 蒋树勇

责任编辑 孙文颖 罗丹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64¼ 插页 4 字数 12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542 - 7

定 价 128.00 元

---

**编委会**

**主 编**

张海惠

**副主编**

薛昭慧 蒋树勇

**编委（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蒋树勇 李国庆 马小鹤

薛昭慧 杨继东 张海惠

**Editor-in-Chief**

Zhang Hai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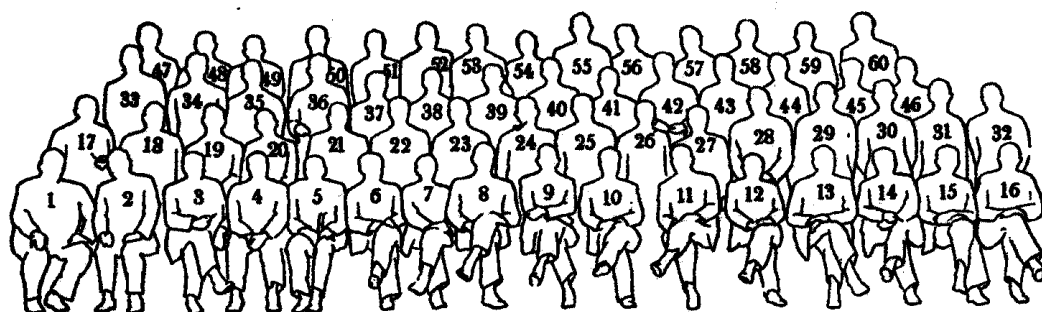
**Associated Editor**

Xue Zhaohui Jiang Shuyong

**Members of Editorial Staff (by Last name)**

Jiang Shuyong Li Guoqing Ma Xiaohe

Xue Zhaohui Yang Jidong Zhang Haihui



##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 |                        |                          |                          |
|------------------------|--------------------------|--------------------------|
| 1. Chauncey J. Hamlin  | 21. H. H. F. Jayne       | 41. Chen Shou-chiang     |
| 2. A. G. Wenley        | 22. L. C. Goodrich       | 42. Mortimer Graves      |
| 3. Langdon Warner      | 23. Arthur N. Young      | 43. Wilma Fairbank       |
| 4. Arthur W. Hummel    | 24. Owen Lattimore       | 44. Charles S. Gardner   |
| 5. Du Bois S. Morris   | 25. Milton J. Clark      | 45. Ch'en Meng-chia      |
| 6. Oswald Siren        | 26. Chen Han-seng        | 46. William W. Marvel    |
| 7. Liang Shu-ch'eng    | 27. Tung-tsu Chu         | 47. A. H. C. Hill        |
| 8. George Rowley       | 28. Harold D. Lasswell   | 48. P. J. Kelleher       |
| 9. David N. Rowe       | 29. Ernest T. DeWald     | 49. D. R. Coffin         |
| 10. Fung Yu-lan        | 30. William W. Lockwood  | 50. Charles B. Fahs      |
| 11. George E. Taylor   | 31. Reuben H. Gross, Jr. | 51. Derk Bodde           |
| 12. Chen Ta            | 32. Sandy Pringle        | 52. Roger F. Evans       |
| 13. J. J. L. Duyvendak | 33. John A. Pope         | 53. George B. Cresney    |
| 14. E. R. Hughes       | 34. Laurence Sickman     | 54. H. G. Creel          |
| 15. W. L. Holland      | 35. Ransom R. Patrick    | 55. Knight Biggerstaff   |
| 16. K. S. Latourette   | 36. Alfred Salmony       | 56. Chih Meng            |
| 17. L. Bachhofer       | 37. K. T. Wu             | 57. Alan Priest          |
| 18. J. D. Breckenridge | 38. John E. Orchard      | 58. H. Lester Cooke, Jr. |
| 19. B. Rowland         | 39. Wang Kan-Yu          | 59. A. Doak Barnett      |
| 20. J. M. Plummer      | 40. C. Martin Wilbur     | 60. Karl A. Wittfogel    |

# 序

许倬云\*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学”研究在美国的现况,各篇章反映某一专业范围内的研究情形。有些撰写人会回顾这一领域的发展过程,但也有个别章节只叙述目前的情况。我的专业是历史,职业训练培养了我追寻发展过程的习惯。而且,一切事物的现况,都有其过去,有切不断的因缘。因此,我还是尝试在历史的视野里瞻顾“中国学”的演变途径。

虽然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的“中国学”,但我还是想先讨论欧洲的中国学,亦即所谓的“汉学”。毕竟欧洲的汉学早于美国,美国早期的中国学长期受欧洲学术传统的影响。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兴趣,早在启蒙运动时代就已经萌生。当时,为了摆脱天主教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体制,欧洲人对东方的另一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有一番向往,盼望借他山之石,作为改革的依据。一些学者,包括格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等人,从来华耶稣会教士寄送欧洲的报告,撷取资讯,建构了理想化的东方。这一番努力毋宁是为了发抒自己理想的郢书燕说,难免有失真之处。

18世纪以后,西方与中国的接触较多,西方商人与外交人员从东方带回的讯息,与过去建构的东方大不相同。欧洲学术界遂开始认真地尝试了解中国。法德

---

\*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万古江河》、《我者,他者》等。

两国的汉学是将西方近代学术的经验直接施之于中国研究。那些学者,各自在语言学、档案学、考据学等方面已有训练。同时,他们也从西方及中亚旅行者的记录深入研究中国,其成就遂能在欧洲最高学府有资格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分庭抗礼。法国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和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 )父子,北欧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等都对中国学研究有重大贡献。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也很受这些人物的影响。

在传统汉学领域外,欧洲的学术课题对于中国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冲击。马克思理论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及其衍生为东方集权政体的性质;韦伯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中国模式及为何资本主义萌生于西方;后来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的中国优秀工艺科技传统为何在16世纪后不能赶上西方的近代科技;这三大课题,其潜台词毋宁都隐含着西方与东方有极大差异的意思。犹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说,东是东,西是西,两方永远不会交集。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其实即是指陈西方人以其自己的尺度,界定东方是“他者”,这一潜台词,反馈于中国与日本,也是东方自居于西方界定的性质,甚至于袭用西方的尺度,以界定自己。例如,长久以来,中国与日本都用西方历史的“古代—中古—近代”三段分期。又如,马克思已将东方列入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却还在硬生生地套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段分期。

欧洲的近代学术研究已经相当发达时,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不过是欧洲的附庸。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还有一段成长过程,方能逐渐发扬光大。

美国人开始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英国的中国研究颇为相似,都与19世纪以来的在华传教与对华贸易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是由传教士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出任的,美国耶鲁大学的汉学讲座也是由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开始。美国派出的传教士,有很大比例是前往中国;在华外国传教士中,美国传教士占了半数以上。他们在华传教之外,还参与不少社会服务,例如教育、医药、救灾等等。同时,美国对华贸易乃是美国外贸的重要部分。来华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商贾、外交人员,及在教会学校执教的教员,都将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资讯转输给美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东北诸州的大学及博物馆等都获得了丰富的文物和图书。而由华返美的学者,则转入大学,培训中国学的人才。另一方面,美国青年赴中国传教,既能学习中国语文,也有直接观察的机会。然而,如此庞大的储才库却没有能促使大学和研究

单位发展专业的研究群体。到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全美的中国研究专业学者还只是以百计。胡适之曾经组织巴尔的摩中国研究圆桌会议,参加的学者不过数十人而已。那时的华语教学体系,学生也有限。20 世纪早期,若有学生要学中国文言文,以研究中国典籍,只有追随贝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等有数的几位学者。整体言之,美国的中国研究受惠于传教与通商,也多出于实用的目的。美国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及传布福音的教化心态,也有着潜台词:强大,富有与文明的“我者”,尽心尽力,施惠于善良、贫穷与落后的“他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决定了早期美国中国研究的课题。

1930 年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世界列强。从此至二次大战以后,依然执国际之牛耳。在为期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也经历了关键的历史时期。北伐成功后,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终于爆发成为时八年的抗战。国共之间的对抗,最后又经过五年内战,中国身处惊涛骇浪的大变化中。这期间,美国却正在迅速扩大其国际影响,中国更是美国可以伸张的空间。反映这一形势,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也有了自己的方向。

美国的中国研究,因基于美国人寻求了解中国现状的急切需求,媒体人员与学者纷纷报道有关中国的讯息,媒体注意重点在政治与战争,学者的研究课题则超越了传统的“汉学”,不再局限于文史语文为主的范围。赛珍珠(Pearl S. Buck)的丈夫约翰·巴克(John L. Buck)、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 1896—1963)、德效骞(Homer H. Dubs)、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莫顿·弗里德(Morton H. Fried)等人的研究广泛包含了社会结构、地理条件、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课题。他们的著作至今还有相当的价值。抗战前及战时,也有不少文史哲学者来华,例如顾立雅(Herlee G. Creel)、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德克·卜德(Derk Bodde)、傅路德(Luther C. Goodrich)、恒慕义(Arthur W. Hummel)、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ry)等人与中国学术圈有颇多切磋,吸收了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配合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遂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代宗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大革命及之后的冷战,创造了美国对华研究的重大发展。美国青年,在远东战场上归来,对东方有了直接的认识,美国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 又称 *G. I. Bill*)资助复员军人深造,公私基金会的补助研究计划,战后大学的扩张等等,都使美国的“区域研究”有了空前的开展,其中尤以“中国研究”为发展重点。

当时的国际情势,使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有机会吸纳欧洲与中国的学术资源。希特勒反犹太政策使许多犹太学者辗转来美,例如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等

人。而中国的抗战及内战,使许多中国学者来美国执教,如赵元任(Chao Yuen Ren)、李方桂(Li Fang-Kuei)、萧公权(Hsiao Kung-chuan)、洪业(William Hung)、邓嗣禹(Teng Ssu-yu)、杨联陞(Yang Lien-Sheng)、刘子健(James T. C. Liu)、杨庆堃(Yang C. K.)、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刘大中(Liu Ta-Chung)、周舜莘(Chou Hsun-hsin)、何炳棣(Ho Ping-ti)、袁同礼(Yuan Tung-li)等。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能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发挥了关键性的扶翼之功。他们与美国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彼此之间,亦师亦友,却经常自居客位,让学者叱咤风云,成就学者的领导地位。

这一代的弟子们,在此后二三十年,分布于全美各大学及研究单位,1960年代以来,各处公私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专业者,不下百余所。其中大型中心有十余处,中型中心有十余处。大多院校则大致会有三、五位中国研究人员,分别在人文社会学科执教。1950至1960年代培养的学者,早期有贺凯(Charles O. Hucker)、芮沃寿(Arthur Wright)、芮玛丽(Mary C. Wrigh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等人,后期有魏斐德(Fred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罗斯基(Thomas Rawski)罗友枝(Evelyn Rawski)夫妇、白威廉(William Parish)等人,都卓然有成。美国的中国研究规模已颇为宏大,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简称AAS)的年会会员人数,也约有三、五千人之多。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已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外,拥有了最大的阵容,最多的图书,最丰沛的资助经费。出版的论著,也不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所能望其项背的。

1950至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变动、经济形态的变化、族群关系、国家权力、中央与地方、城乡关系、宗教与民俗、经典文学、艺术、音乐等等,无不有学者倾其心力,沉溺研究。其中若以研究课题定,在早期(1930、1940年代),大约涉及中国能不能走入现代世界,后则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为何在中国能够夺取政权,这两个题目先后凝聚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两大陈述方式。

接着,日本汉学界提出的东洋/中国之变、中国国家特色理论及内藤唐宋转型理论所涉及的中国“近代的起点”,凡此理论,都融入美国的中国研究之中,成为讨论聚焦之处。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终究还是有其潜台词:中国为何不能演变成像西方一样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这种心态,还是以西方尺度与模式揣度中国的特质,及因为这些特质而不能发展为“现代”。1950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发动反

共的学术迫害,应对美国朝野的质问“美国如何失去了中国”?言外之意,中国本来应是生存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这种心态,还是自居为老大哥,亦因为中国的变化,竟是如此地不可思议!借用轻歌剧“My Fair Lady”的句子,稍加修改: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像我们(美国)一样?”(原句是:Why can't women be like men?)

1980年代后,情势起了变化。中国在改革后逐渐崛起,引起世人注意,研究中国成为热门。柯文(Paul Cohen)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历史学家,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撰文对以西方立场研究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提出“中国中心论”,主张中国研究应以中国及中国文化为主体,讨论其内容与发展。柯文的论文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我们必须注意,柯文的论点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196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异常宁静的文化革命。自由主义者坚持回归个人自主性,以求摆脱权威与传统的规范。同时,世界各处接触频繁,不同的文化必须共存,文化的多元性已是日常经验。再则,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引发了妇女运动,各种弱势人群也要求机会平等,不容所谓“主流”社会独占发言权。中南美各处的独立革命运动,也指斥殖民主义下弱者的依靠与附属于权威。他们的指证证实了赛义德“东方主义”症状对于区域研究造成的扭曲。这股思潮伴随而起,加强了冲击力。

柯文的观点,也反映了一时的文化剧变。当时在法国已有相当影响的年鉴学派,研究方向指向文化与自然条件和相应的社会与经济情况,却将政治与上层思想认为是较为短暂的表面现象。于是,年轻的学者们,感受时代风气,选择研究课题时逐渐改变了趋向:常民生活与心态、地方与边陲、妇女、劳工、农民与弱者的地位、生态环境等种种问题遂为学者关心之所在,一改以帝王将相、国家制度、战争与外交、思想大师等为研究重点的传统。

20世纪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昭然可见,虽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世界性经济系统的出现,追溯到16世纪时大洋航运联络了几个大陆,形成庞大的经济网络。20世纪的两次大战,发达的交通工具,以及最近迅速发展的资讯革命,地球各处的人们确实已经连在了一起。“地区研究”在全球整合为一体的情势下,已是明日黄花。因此,最近十余年来,跨地区的研究,包括地区之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以及地区之间的比较与对照,已是常见的学术课题,有人甚至认为“地区研究”已不再重要。

这些现象令人悚然警觉,今日再将“中国研究”当作一个学术项目是否还有意义?尤其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在此大转变的阶段,下一步究竟会走向何处?

我经常参与美国地区学术评审的工作,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一些趋

势：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抑是中国研究的范围，研究课题逐渐由国家转向社会，精英思想转向平民心态，典章制度转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献转向访谈与计量，关心主流转向关心弱势，宗教研究转向信仰与仪节，个别人物转向一般众人，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运动，单一现象转向多项的整体讨论，以及经济之外，还注意生态与天人关系等等。凡此现象，都指向一个趋势：过去的传统与今后的发展之间，未必再是单纯的延续与开展。不过，议题分散也可能造成无法聚焦的后果，以致虽有陈述，却不易分析；数量增加，却难有累计增长。虽然学术探索领域开拓了，却可能蔓延而难以阐释其义。这是一个拓荒的时代，如何整合，有待学术界的努力。

回到编纂本书的宗旨，亦即海外中国研究的现状。一百多年来，前一段乃是西方在摸索中国的面目，中间一段是西方想要改变中国，冷战期间，西方欲了解其敌人的内情。因此，所谓“观察中国”(China Watch)，曾经是政治、社会、思想各个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最后一段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已不再是吴下阿蒙，西方更是投入了大量资源。如何面对这个不可忽视的中国，将中国当作既须合作，又难免冲突的伙伴。这段发展，恰恰叠合于学术研究出现大转变的契机。

从西方学术界的形势论，将来的中国研究可能不再是列在“主流”学术圈外的一片“边区”。一百多年来的成果，无论质量抑或数量，“中国研究”已可与主流的西方研究相埒。下一步，中国研究将融入“学科”之内，以“中国研究”的成果，参加建构理论的依据。这一防线，大概势所必至，好在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关键只在能否走得顺畅。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海外中国研究的成绩确实有可佩之处。尤其中国曾有过数十年的寒冬，学术田园形同荒芜，至今已有转机，但还谈不上春华秋实。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颇有填补空白的功能。国内学术界，久旱之后也可能敞开胸怀，照章全收，甚至视西方的中国研究为范本，不假思索，亦步亦趋，奉为真理。但我身居海外数十年，常常感觉人文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数理科学，学者终究必须通过语文关口，同时文化的临场感也制约了观察与陈述的能见度与敏感性。如果说西方人在使用与领会中文资料方面有其不足之处，但他们对西方文学表达与复述方面则有驰骋的空间。在临场感方面，西人可以客观地观察中国人所习以为常之处，却也未必人人都有鱼在水中的直接感。反过来，中国人恰是在理解中文资料方面有其长处，却不易掌握西文的表达与复述。且中国人身在庐山深处，又未必能见到庐山的真面目。

任何学术研究人员，尤其“地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具备能出能入的反省功夫，既能从情境外做客观的观察，又能进入情境，领悟体会其不着言詮之处。如此

徊还映照,方能得到适当的分寸表达陈述。再进一步阐释解读,终于建构理论,以抽绎其普遍性的意义。西方学者中的前辈及中国学者中的通人,往往可以到此佳境。近数十年内,台港大陆的学生,中文能力已有不足,目前未必能够欣赏传统文化,将来是否有人能出入内外境界,颇令人担忧。

总之,中国人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中国文化的发展历时久远,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库中不能缺少中国这一大块。陈述与解释中国经验,是了解人类经验的宏大事业,不论华人或西人,都应有人投注心力,参与其中。西方人已提供了不少成果,中国人更该投身于这一共同的志业。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本书已有许多专家提供篇章。集合众人著作的文集,必有许多不同的观察角度,以及个别的陈述方式,各篇品质也未必整齐。好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许多篇章合在一起,有心人还是可以睁开双眼,参悟妙处。这一番努力,绝对是值得的。

2009年6月17日

于匹兹堡

## 缘起及说明

张海惠\*

一年一度的“亚洲年会”，让整日没于书堆和资讯的我们得以从日常工作抽身。区区三五日，却是难得的相聚机会。

2008年4月初，第60届“亚洲年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召开。会议期间，一日的下午茶时分，我和几位工作于美国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同仁在会议所在地 Hyatt Regency 饭店的咖啡厅小憩。他们是斯坦福大学的薛昭慧、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的蒋树勇、哈佛大学的马小鹤，以及当时供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职于密歇根大学的杨继东。都是文史专业出身，如今又从事同样的工作，感兴趣的话题自然不少。除了叙旧，少不了聊起海外学者有关中国的种种学术研究。其间，一个在我脑海里生成了许久的想法一经出口，便得到了在座同仁的一致赞成和鼓励。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最初认识，始于几十年前的学生时代。谁曾想，若干年后我们不仅投身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资讯工作，还见证了自198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目睹了北美取代欧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重心的事实。而多年来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史学及文献学素养，让我们意识到了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阶段性的总结不仅能够集中盘点过去几十年北美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对日后北美以至世界范围内中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于是，在大家的鼓励下，从亚特兰大回到匹兹堡，我便着手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启动工作。Hyatt Regency 饭店咖啡厅小憩的同仁自然成了项目

---

\* 张海惠，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

骨干,后又有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具有丰富编辑出版工作经验的李国庆的加盟。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本《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的问世。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作了不少调查和研究,先后出版了数种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北美中国学研究的专著,如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先生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等,这些著作作为国内学界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情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身在北美不同学术领域的中国学研究者也先后在不同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对本领域学术研究予以综述的文章。然而,《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却是第一次由在美学者执笔、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之结集。由于身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这些综述的撰写者不仅对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有更多也更为深入的了解,并有着与身在美国之外的学者不同的观察视角。而不同学术领域综述之结集,则不仅使北美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学研究信息融于一册,也有助于读者在了解每个独立学科的同时,了解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

作为主编,我对这本书的意义以及日后所能起到的作用深信不疑,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全面而丰富的内容,也因为它所表现出的学术批评性、兼容性和互动性,以及提供的丰富学术信息。

### 全面的内容

为这部书撰写文章的北美中国学学者共有 37 位,他们的综述文章涵盖了北美学术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充分反映了北美中国学研究之广度。几十篇学术综述共同勾勒出过去几十年间北美中国学研究之足迹及其现状。

由于每个学科有其自己的发展历史,或为传统学科,或为新兴学科,本书采取了在学科发展现状基础上,以学科领域、断代、专题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篇章撰写工作。如在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金鹏程(Paul Goldin)、李峰、陈美丽(Cynthia L. Chennault)和裴士凯(Scott Pearce)、陆扬、魏希德(Hilde De Weerd)、柏清韵(Bettine Birge)、何义壮(Martin Heijdra)、罗友枝(Evelyn Rawski)、叶文心、程洪等对自早期中国(early China)至现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分别撰写了综述文章。同时,针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热门”及颇具争议的专题研究,我们也特地邀请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就中国科技史研究,苏成捷(Matthew Sommer)就清代法制史研究,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就清代经济史研究,卢苇菁就妇女史研究,汪利平就城市史研究撰写了专题研究综述。同样,在文学史方面,柯马

丁(Martin Kern)、田晓菲、艾朗诺(Ronald Egan)、伊维德(Wilt Idema)、王斑等学者分别撰写了中国不同时段文学研究综述,鉴于近几十年北美中国戏剧研究的进展情况,也特意安排了田民对这一研究领域所作的概述。

过去的几十年,北美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得以蓬勃开展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现象已成为汉学研究向中国学研究转变和延伸的重要特征。虽然从整体上讲,本书中社会科学研究综述文章所占比重仍然小于人文科学领域文章之比重,但几位学者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综述共同为北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过去与现在做了全面揭示。例如,边燕杰和周雪光分别从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以及中国组织现象两个领域对北美中国社会学研究作了十分全面的总结。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唐文方分别通过对1949年至1999年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钩沉,以及最新研究趋势简述的方式,对北美中国政治学研究作了展示。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以圈点中国经济研究演进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列举吸引众多学者开展研究的课题,指出中国经济研究的拓新途径的方式,对北美中国经济研究予以扼要陈述。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就美国关于中国外交关系及安全政策/军事的专题研究作了详细梳理和分析。

同时,全面展现北美中国学研究的面貌,不可缺少以下这些学者的学术综述:梅维恒(Victor H. Mair)和李亚非的文章对于了解北美有关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历史轨迹和现状是不可不读的。荣鸿曾(Bell Yung)的文章提供了中国音乐研究领域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学术信息。刘怡玮(Cary Y. Liu)就中国古代艺术史领域学术观念和 research 方法的演变作了具有特色的学术综述,高名潞则对美国当代中国艺术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状况作了既精要又重要的叙述。陈怀宇和赵昕毅(Chao Shin-yi)分别对北美佛教研究,以及道教和民间宗教研究的概貌和成果作了详细阐述。戎雪兰的中国教育研究综述、罗伟的中国法学研究综述都是构成北美中国学研究全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虽然同属学术综述,但由于各个领域的历史不同,发展现状不同,学者观察的角度不同,因此每位学者都有其独特的撰写方式和特点。例如,罗友枝以专题叙述的形式,对过去二十年间北美清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和研究趋势作了概述;何义壮则采取全面回顾和考察《明史研究》(*Ming Studies*)的形式,来勾勒北美明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罗伟是通过对每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叙述来体现北美有关中国法学研究现貌的;等等。不论采取哪种陈述方式,每篇文章传递的都是关于某一学术领域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学术信息。

书中绝大部分综述都是学者特为此书撰写的,虽有三篇文章发表于数年前,但

由于作者对本学术领域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征得许可,也被收录在这本书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裴宜理和沈大伟的文章外,还有郝瑞(Stevan Harrell)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综述。

由于北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也体现在近年来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博士生的培养方面,无论是迅速增长的博士生人数,还是日渐丰富的研究课题都印证了北美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事实。为了表现这种发展,本书特地收录了徐鸿对最近5年美国大学有关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所作的定量分析,揭示这一领域博士生培养现状的文章。此外,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汉语教学并不属于北美中国学研究之范畴,但基于近年来北美“中文热”的现实,以及未来中文普及对中国学研究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姚道中(Yao Tao-chung)和姚张光天(Yao Chang Kuang-tien)也受邀特为本书撰写了北美汉语教学回顾及现状概说的文章。

### 学术批评精神、学术研究兼容性和互动性

翻开此书,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北美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特点,包括学术批评精神、学术研究兼容性和互动性。

所谓学术批评精神是通过不同方式体现的,例如,在北美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领域,围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oy)“大分流”之说已开展了近十年的学术争论,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对此都有所反映。同时,本书也收入了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撰写的反思清史和世界史之大分流论辩的文章。又如,刘怡玮以严谨的态度,就北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和质疑精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客观、如实地记录学术领域里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及勤于思辨的方式体现了北美学术界所具备的学术批评精神。此外,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学者们对目前北美中国研究存在之不足所提出的中肯意见,如许倬云先生在其序文中指出,“‘地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具备能出能入的反省功夫,既能从情境外做客观的观察,又能进入情境,领悟体会其不着言詮之处。如此徊还映照,方能得到适当的分寸表达陈述。再进一步阐释解读,终于建构理论,以抽绎其普遍性的意义。”实际上是指出了北美中国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更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诚恳地就本研究领域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学术研究兼容性不仅体现在学者个人的研究中,也体现在他们对本研究领域整体的反思上,体现在他们对学术健康发展的愿望上。李峰在指出早期中国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论“源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以及支撑各自传统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中美两国学者应当运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同时吸取他人所长,将

早期中国研究视为全球性学问而共同努力和合作,才能将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唐文方则在其文章中强调,应当加强中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中国纵然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但若一味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则无法让世界分享中国的经验,也无法使中国政治研究融入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之一的政治学的主流中去”。

与此同时,不少文章所表现出的各学科研究成果之间的相互印证则体现了北美中国研究各领域之间的学术互动性。例如,周雪光对涉及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在内的、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英文文献作了全面考察,在以一个全新视角对中国组织现象研究予以述评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和组织学之间互动和互惠的学术关系。又如,罗斯基不仅在其文章中对北美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还列举了非经济学家(如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学家等)所取得的、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和成果。此外,几乎每位学者都对过去二十年来,中美两国学者之间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这种良性互动视为北美中国学研究蓬勃开展、成果显著之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或许这些综述文章所论及的一些学术观点尚不成熟,甚至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至今为止北美中国学研究现状的真实记录和表现。总结了以往,便是开启了未来。何况,这些文章除了展现北美中国学研究全貌外,也确实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或许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和借鉴的东西,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术批评精神、学术兼容性和互动性外,还有关于研究题目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采用、学术研究社区的建立等等。此外,这些文章所表现出的北美中国研究清晰的学术脉络,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丰富的学术信息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仅通过学术研究综述的形式,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学术成果,不少学者们还对未来本研究领域的学术走向和发展前景作了预测。由于这些预测是学者们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队伍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做出的,因此同样是重要的学术信息。同时,还应当注意到,除综述文章本身,不少学者还通过文后注释为读者提供了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学术文献信息。如荣鸿曾在全面概述北美中国音乐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同时,也使其文后注释具有了一个可以独立使用的专题书目之功能。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近几十年来北美中国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除学术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成果丰硕外,也表现在中国研究文献服务工作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学术研究是离不开高水平的专业文献资讯服务和支持的,尤其是在当今的信息化和数